

“监守自盗”与自我的复归

谷容林

“监守自盗”与自我的复归

——梨

园戏《董生与李氏》中董生的心理分析

容林

谷

(厦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讲师，厦门大学中文

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作为现代梨园戏的代表作，《董生与李氏》中的董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矛盾心态和不断斗争的自我。本文采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精神分析理论，剖析了董生在“监守自盗”过程中所展现的自我压抑与被压抑，本能的满足，以及最终达到自我复归的心理历程，从而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在本能长期受到长期压制下的自我生存机制。

关键词：精神分析 监守自盗 本我 超我 压抑 自我复归

《董生与李氏》[i]是一出梨园戏。全戏共分五出，第一出“试探”，第二出“每日功课”，第三出“登墙夜窥”，第四出“监守自盗”和第五出“坟前舌争”[1]。其中，监守自盗构成了《董生与李氏》一戏的中心情节。整出戏情节简单，但戏剧冲突集中而鲜明。清平的教书先生董四畏在彭员外临终请托下，开始了监视隔壁遗孀李氏的每日功课，却苦于无法找到

出墙的证据。董生心有不甘之下，登墙夜窥，希望证实心中所想。结果，奸夫没有找到，自己却登堂入室，监守自盗。面对彭员外幽灵的诘问，突如其来的文人豪气让董生舌战彭员外，抱得美人归。大团圆的结局未能遮蔽董生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作者王仁杰在二十世纪末写作了一批文词优美，内容丰富的梨园戏剧本，从《枫林晚》、《节妇吟》、《陈仲子》、《董生与李氏》到《皂隶与女贼》。鲜明的文人形象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剧作中，“这个形象从各个角度被深化、被延展。无论是沈蓉、陈仲子还是董生，这些文质彬彬的书生文人，因为文化制约的结果，自然活力和创造精神、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自觉都严重销蚀。”[ii]《董生与李氏》中董生的形象极具代表性。本文以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视角，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文人在本我受到长期压抑下的自我生存机制。

一、情感与理想人格的缺失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其中超我又被称为“自我理想”[2]。“力比多(libido)”是“本我”的主要构成成分，它的行动原则是“快乐原则”，不受道德限制，旨在追去本能的欲求以获得满足。“自我”则代表了“我们所谓的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和含有情欲的本我形成对照”[iii]，是知觉系统。而“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反应了父母和社会道德行为机制的影响。正常人格中的“自我”、“本我”与“超我”成分维持着完整性与平衡性。

《董生与李氏》第一出“试探”充分展示了董生人格中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原初状态，及其在本我情感和超我理想中的缺失。

戏一开场，即将“托寡”的彭员外道出了董生的自我状态，“秀才董四畏，蒙馆为业，与吾为邻。”，“年过四旬，尚鳏居”。一个独身、鳏居、贫穷的教书先生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年过四旬，尚鳏居”，且“畏女人”的生活状态就其实质，是董生本我情感的缺失。

至于“久困场屋，然君子固穷，信而好古，好德不好色，而洁身自好”的评价当纳入超我人格的范畴，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最看重的道德范畴。儒家的理想人格有君子、豪杰、圣贤三个不同层次。[iv]这种人生的范型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追求，浇铸了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和行为模式的精神内核。董生的超我定位便是君子。坚持君子的身份和立场便成为统御董生超我世界的核心内容。君子的身份限定了董生的行为模式。作君子，就要克己复礼，要恭敬谦让，要诚信和顺。简言之，要实践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而修身养性的方法为“存心”和“寡欲”[3]，要在保存固有的道德本心基础上，限制自己的物质和生理欲望。于是，“君子固穷”、“信而好古”、“好德不好色”和“洁身自好”成为董生理所当然的日常修行。董生姓名“四畏”中的“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自然是遵守孔圣人

之言，“畏妇人”则是董生克制情欲，实践“礼”的方法。董生斥责彭员外的请托为“鸡鸣狗盗所为，”正是施行道德原则的超我所做出的直觉性反应。

贯穿全戏的君子人格仅构建了超我的一部分，无法遮蔽部分自我理想未得到实现的压抑。“亦广文，亦五柳，环堵萧然岂曾愁。箪瓢空，衣百结，白了双鬓不知羞。断了青云志气，吾教书只为稻粱谋。”这是董生上场时的第一段唱词，深切地揭示了董生未获实现的部分超我。“具有文化知识和经世抱负的中国文人，素来都是以社会道德的训导者和社会政治的设计者而自居的。”[v]作君子只是养性修身的日常功课，经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才是文人的终极目标和理想。董生感叹生活的艰辛贫困，更感慨“断了青云志”的怅惘。无望的仕途是董生的隐痛，也是缺失的理想自我。

二、本我爱欲的突围

当自我以现实原则压抑着本我的快乐渴求，超我则打着道德良心的旗号压抑着自我的理性和行为。处在压抑与被压抑之间的自我，力图维持着自我、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我们的文明建立在对本能的压制之上。每一个体都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vi]在以道德为内核的儒家道统中，中国古代文人的爱欲本我自然受到了长期的压抑。

被迫接下彭员外临终遗命的董生开始了监视李氏的“每日功课”。日复一日的近距离接触中，李氏的美貌和青春韶华蓦然掀开了君子的蔽幃，唤醒了压抑已久的爱欲本能。连勾魂小鬼都赞叹不已的“小蛮腰、樊素口”，在朝夕比邻而居的董生眼中自然无法漠然视之。《诗·卫风·硕人》篇下意识成为了董生教授学童的诗篇。“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美貌的刺激让董生古井生波，本我开始蠢蠢欲动。

“门儿半掩，南风微卷珠帘”时，“玉影约识半面”的美好景致让董生希冀着“每日里但求一瞻。”君子每日里修身养性的“寡欲”教诲被抛诸脑后，本我开始复苏。正在此时，奉命送桔的丫鬟梅香来到书馆，惊醒了初初萌动的本我。董生的超我立刻进行了自我批驳，斥之为“非分想”。第一次本我的复苏为时甚短地结束了，却播下了心火燎原的种子，留下了董生再也无法平静的内心。

红杏出墙的证据久候未至，董生焦灼之下，决定登墙夜窥。于是，借着些许的醉意，“遮得秀才满面羞”，董生笨拙地以“竹椅垫脚”，“梧桐遮影”，登墙夜窥，希望找到隔壁芳邻的出轨凭证。但董生的君子身份，超我的道德准则并不见容如此行为。

儒家道统的基本德目之一便是守“礼”。“礼”是儒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经过“礼”的检视。《董生与李氏》整出戏里，董生将此项原则彻底地贯彻实践着。“礼”自然也参与构建了董生的超我。“偷窥”便违反了君子的处世原则和“礼”的要求。但

“受人之托，不得已而为之”成为董生的借口，对“信”的维护解释了对“礼”的背离，更掩盖了本我的冲动。被压抑的本我基于对快乐的原则的追求，对自我进行不断的能量贯注，以期实现本我的欲求。登墙夜窥的发生也是本我能量贯注的直接后果。[4]

寂静无声的夜晚，皎洁月光下“月影花影树影灯影”中“婷婷玉立”的“佳人影”让董生恍若来到了“桃源境”。聆听着李氏吟唱的元人小令，欣赏着李氏在灯下“春衫窄窄衬柳腰”的美态，董生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魂儿销，心旌摇”。美景，美文和美人美态的刺激使董生的本我再次占据了主导的位置。一声响动再次破坏了昙花一现的本我冲动。自我的知觉系统以自我为代表的理性和常识制约了含有情欲的本我。尽管本我的再次突围以失败告终，但本我的内驱力越来越强大，让循规蹈矩的董生僭越了“礼”的桎梏，产生了“学一个张君瑞”跳墙的勇气。

察觉董生偷窥行径的李氏计上心来，以“骂你个短命薄情材料，小可的无福怎么难消。想着咱月下星前期约，受了些无打算凄凉烦恼”的言词制造了与情人约会的假象。信以为真的董生恼羞成怒，高举“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幌子，在本我内驱力的驱策下，终于决定跳墙捉奸。登墙和跳墙行动的完成，消解了高耸在董生本我与自我间的一面高墙，监守自盗的高潮也随之开始。

跟踪李氏至西厢的董生却踟躅于门外。此时，清醒的超我与自我进行着激烈的抗争。一方面，对超我道德的惶恐让董生的心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清凉的夜风中，他“一步一彷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瓜田李下走，战战亦兢兢”，担心违背圣人的教导。另一方面，理性的自我呼喊要“一诺千金”。终于，董生推门而入，却发现了李氏的谎言，张皇寻找的奸夫原来就是自己。超我作祟下的西厢变成了礼教审判的“白虎堂”。面对企图逃跑的董生，早已芳心暗许的李氏怒骂其男儿本色的丧失，“今生投了王八羔子胎。枉有贼心无贼胆，心想使坏使不了坏。阎王殿判你当男儿，貽笑天下究可哀！”一席痛斥，让董生从“大汗淋漓”、“如芒刺背”的自我汗颜中走向了“浑身通泰”的本我，同时也断绝了董生可能的退路。西厢灯下，李氏“半嗔半怪”的情状，和“万千仪态”的妩媚，形成了直接的刺激和最后的内在驱动，董生终于完成了本我向自我、超我的突围。

三、超我的认同与自我的复位

然而，本我所获得的快乐终究是短暂的。在自我的压抑之下，本我很快回到自我的理性和超我的道德系统中。“超我保持着父亲的性格，当它越来越迅速地屈从于压抑时（在权威、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读书的影响下），超我对自我的支配，愈到后来就愈加严厉——即以良心的形式或许以一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vii]不仅弗洛伊德，霍尔奈也认识到了超我中道

德力量的强大功能。超我中“强迫性的道德目标不屈不挠，决不允许出现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 [viii]

李氏的一句“彭员外”使董生仿佛醍醐灌顶，自我的意识和超我的批判让本我的快乐世界瞬间崩塌，本我与自我的剥离状态终止了。“自我发起了对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的防御斗争”。 [ix]董生如梦初醒，终致“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前后的巨大行为差异来源于董生的罪恶感，而“罪恶感也能被理解为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的表现”。 [x]“无意春光春自临，书生暗室竟欺心。墓前怎报春消息，蒿草萋萋鬼气森。”对彭员外的“信”，作君子的“礼”，以及对前者的违背，直接导致了董生罪恶感的产生，自我与超我的对立。

自我与超我，自我与本我之间的正常模式应是同一的，和谐的。如果长期背离，就可能产生人格的异化和分裂。“由于不同的认同作用被抵抗所互相隔断，可能会引起自我的分裂；或许所谓多重人格这种情况的秘密就是各种认同作用轮流占有意识”。 [xi]所以，正常人都本能地需求人格的统一，以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

全戏最后一出“坟前舌争”出现了彭员外的鬼魂，它代表着董生分裂的部分超我，代表着以道德为中心的儒家几千年“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与超我，自我与本我之战。在超我的审视下，起初受制于自我和罪恶感的董生无地自容，承认了自己的“冥顽”与“行短”。而随后鬼魂的残忍，以及不忍“红粉尸横，刀剑戮芳卿”的冲动，让董生冲冠一怒为红颜。本我力量的持续贯注，以及对自我人格统一性的渴求让迂腐怯懦的董生一反常态，犹如神助般地发出了“自古我儒生，浊世为精英。文有治国策，武可作干城；威武不能屈，危难见贤贞”的豪迈之言，做出了质问彭员外鬼魂的勇敢之举。

坟前舌争中，董生发出了一连串的诘问，“你撒手西去，留下夫人为你守活寡，一旦有差池，更以刀剑相加，你仁乎？”“你是鬼，不是人。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不事人，焉事鬼——你知乎？”“你明知她寡，我鳏，竟以怨妇托旷男，你智乎？”，继而得出了结论“你不仁不智，终陷人于不信不义，谁之罪？谁之过？况且，吾与夫人，诚意正心，两相情愿，行人大伦，正君子之仁也，义也，礼也，智也，信也，何过之有？何罪之有？”一连串的诘问中，董生的自我与超我，自我与本我正面交锋，争取着本我的合法性。

想要重新获得自我与超我的和谐，想要获取本我的满足，董生必须取得他与李氏爱情的合法性。儒家道统中的行为准则成为了董生的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超我的争辩中，监守自盗的行为，以及本我爱欲的满足终于在超我道德系统中取得了合法性认同，君子的“仁、义、礼、智、信”诡异地得到了维护。彭员外鬼魂的退却则象征着超我、自我和本我的同一。本我的爱欲情感得到实现，超我的道德得到认同，部分本我进入了董生自我的心理层面，实现

了自我的复位。自我的失而复得，如同经历了一次自我的涅槃。涅槃后的自我已具有了一种新质，它比以前的自我更加强大，也更具活力和希望，因而缓解了董生最初时自我理想的缺失

董生的心理生存机制代表着作者对古代文人心理和人格生存状态的探求和反思。与历史上为数众多人格分裂的文人相比，董生是幸运的。经过爱欲的挣扎，超我的批判，最终还能达到人格的完整与融合。由于剧本对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模糊化处理，使得这一探求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1] 本文中所有的剧本引文均出自王仁杰的《三畏斋剧稿》中的《董生与李氏》。

[2] 弗洛伊德在1921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在“自我的等级区分”假定中，提出“自我理想”的概念。但后来又在1923年的《自我与本我》中重新将“自我理想”确定为“超我”。本文中，“超我”与“自我理想”属于同一含义，都是对道德、责任、良知等更高层次的追求。

[3] 这是孟子提出的人性修养方法。

[4]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追求快乐原则，自我则追求现实原则。如果本我的快乐未被满足，这种不快乐便会提高能量贯注，用压抑的冲动抵抗自我，直到本我的冲动得到释放，快乐原则得到满足。

[i] 王仁杰. 三畏斋剧稿[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ii] 王评章. 三畏斋剧稿序言[A]. 王仁杰. 三畏斋剧稿[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P8.

[iii] 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A]. 杨韶刚译. 弗洛伊德文集: 第六卷[M]. 吉林: 长春出版社, 2004. P126.

[iv] 唐凯麟, 张怀承. 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M]. 湖南: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9. P104.

[v] 孟广林等. 凹凸文心[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7. P246.

[vi] 弗洛伊德. “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A]. 宋广文译. 弗洛伊德文集: 第三卷[M]. 吉林: 长春出版社, 2004. P 85.

[vii] 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A]. 杨韶刚译. 弗洛伊德文集: 第六卷[M]. 吉林: 长春出版社, 2004. P134.

[viii] 卡伦. 霍尔奈. 精神分析新法[M]. 雷春林等译. 上海: 海文艺出版社, 1999. P137.

[ix] 弗洛伊德. 抑制、症状与焦虑[A]. 杨韶刚译. 弗洛伊德文集: 第六卷[M]. 吉林: 长春出版社, 2004. P 176.

[x] 弗洛伊德.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A]. 熊哲宏译. 弗洛伊德文集: 第六卷[M]. 吉林: 长春出版社, 2004. P 97.

[xi] 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A]. 杨韶刚译. 弗洛伊德文集: 第六卷[M]. 吉林: 长春出版社, 2004. P131.

厦门大学图书馆